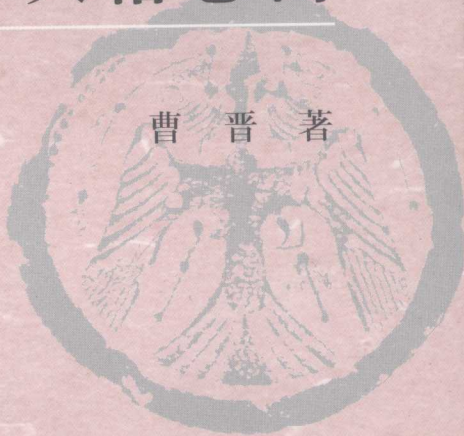


文史哲研究丛刊

屈原与司马迁的 人格悲剧

曹 晋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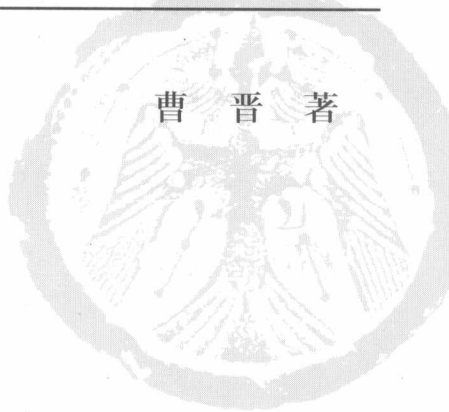
文史哲研究丛刊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出版研究中心课题基金资助出版

屈原与司马迁的 人格悲剧



曹晋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曹晋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4924-5

I. 屈... II. 曹... III. ①屈原(约前340~约前278)—人物研究②司马迁(约前145~前90)—人物研究
IV. K825.6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2049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

曹 晋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淞杨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4924—5

I·2007 定价:24.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聂石樵

三年博士求学，曹晋潜心阅读，她青春足迹的一部分已经刻印在这本博士论文的字里行间。在曹晋准备论文的过程中，她搜集了详实的资料，反复向导师请教、修改，最后成文，圆满通过了论文答辩。我曾经在曹晋的博士后申请书的推荐意见中写道：“曹晋同学思想作风正派，品质端正，作为中共党员在各项工作和专业学习方面都能起带头作用，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多项奖励，是博士研究生中的优秀分子。”时光流转，曹晋博士毕业已近十年的光景，回首往事，她求学的勤苦、信念的执着与品性的坚毅，依然历历在目。

韩愈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认为导师辅导之下，对每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的确定，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职责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培养环节。一方面，导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取向来切实地指导学生的学术探索；另一方面，学生从毕业论文的扎实训练中，确立自己未来工作岗位的研究志趣与事业方向。

我一直认为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他们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对他们以前的文学作品、文化遗产作了总结。他们各自处在一个由鼎盛转向衰败的时代，他们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这一转变时期的历史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他们对生存的时代的腐朽因素的批判和对未来新愿景的憧憬，正是时代的鲜活的进步动力。屈原的作品围绕着楚国贵族集团专断统治的黑暗政治与坚持不懈的抗争意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焉”的家国忧患意识。司马迁的《史记》总结了汉武帝以前三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汉武帝时代，空前兴盛强大，盛之始，衰之渐

也。随着桑弘羊平准政策的成功,社会弊端也在滋长、丛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司马迁,他横溢的天才文笔饱含着浓烈的感情,深刻地批判社会的各种弊端,在苦闷中找寻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答案。

当年,师生之间经过屡次讨论,我认同了曹晋把论文选题聚焦于先秦与西汉的两位文化巨匠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分析,这样的毕业论文写作可以磨炼学生对古典文学关键性知识的深入钻研,也利于日后教学与科研的工作重点的选择。综观曹晋的毕业论文,其论证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基础之上,逻辑思辨性强,吸收了跨学科的学术成果,拓展了古典文学的理论品质,尤其是引入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有关统治者合法统治的基础的历史演变理论,来阐释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屈原、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异同,这丰富了古典文学与具体社会情境的关联性阐释。论著附录的四篇论文,是曹晋从博士求学到博士后研究期间,在《文史知识》、《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江汉论坛》等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这些单篇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浸透着作者对古代文学的体验,以及对屈原、司马迁那种寂寞的、郁结的挫折与悲剧的理解,作者的情绪陶醉在伟人作品的风骨之中,笼罩于文化巨匠的精神之下。任何博士论文总会留下遗憾,时间与知识结构等因素也会导致论文的某些缺失,还请读者们对论述的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学生的成长是老师的欣慰泉源之一。看着学生们的一点一滴的事业积累,我的内心也流淌着快乐、欣喜! 1998年夏季,曹晋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即将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时,我写了《易经》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临别赠言。实践证明,曹晋依然游弋于无涯的学海,在不断地履行着这段格言的精神。今天,我仍然以此警句,激励她对于学术与生活的不断进取。

序

周勋初

我与曹晋的导师聂石樵教授早就熟识,然而曹晋取得博士学位后转入我系博士后流动站,聂先生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因此对曹晋的了解,可说是一一从头开始。

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申请表,相片上是一位年轻的小女孩。附来有几张书法作品,引起了我的兴趣。目下年轻学生书法好的不多,她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很罕见。见面后询问起这事,始知是家庭熏染之故,她的书法功底是在其父亲的指导下步步提高的。后来我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时,就让她题写了书名。

她读的是古典文学专业,进站后改为专攻民俗学,原来她在北师大时曾兼修钟敬文教授的民俗学博士课程,所以要把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完成。由此可知,她在北师大求学时曾广泛地向该校多位名师学习,在几种学术分支中谋求发展,经过努力,已均有所成。

曹晋的外表一看就知道属运动员类型的人物。经过交谈,不出所料,她确实从小就与体育有缘。从小学时代就兼上体校,打过篮球,进入过省赛艇集训队,因此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过程,也是连蹦带跳的,跟她的运动生涯差不多。这时我才明白,她在学业的最后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点,顽强拼搏的锐气,不断开拓的精神,跟她的人生经历完全一致。她的性格,是在不断磨炼中形成的,难怪她的博士论文以人格为题,而人格的完成即个人的性格密切相关。

我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工作特别忙,教学、行政、科研和各种社会活动,老是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对她入站后的学习,关心得很不够,但我知道她自理能力很强,这也是从小就培养出来的一种优点。这时她还在抓紧时间修改博士论文。因未成熟,似乎没有让我看过,反正这时就是交给了我,我也难以顾及。但她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二

期上发表了《〈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一文,却使我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她博士论文可能会达到怎样的一种水平。

新旧世纪之交,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总结二十世纪各类专题学术成就的文章。这种事情看似容易,实则颇能说明撰文者水平的高下。有的人掌握材料不少,但既无概括能力,又无学术眼光,写出来的东西,话说不到点子上,反而会贻误读者。曹晋写的这一《述评》,很有学术高度,将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先依时代发展分为若干阶段,再将涉及的问题分别门类,予以评判。从中可见,她的分析能力很强,概括能力足以相副,还能独出手眼,揭示其中得失。最后还加以总结,指出《史记》研究的新方向。她在全文结束时说:“这就要求《史记》学术研究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条件,既有材料的进一步发现、整理、考证和诠释的过硬功夫(研究者的传统国学素养是必须好好修炼的),又有新学理的吸纳、运用、释疑、解难的贯通才干。”

可知这是她对学科发展的期望,也是她的努力方向。

目 录

聂石樵序	1
周勋初序	3
绪 论	1
第一章 研究概述	3
一 中西人格界定的差异	3
二 屈原与司马迁人格研究述略	5
第二章 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	18
一 屈原生活之时代	19
二 屈原、荀子的政治思想比较	22
第三章 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定型	27
一 司马迁生活之时代——大一统帝国之建立	27
二 大一统文化意识	31
三 天人关系论	33
第四章 屈原与司马迁人格探源	39
一 坚持理想,追求崇高	40
二 修身与好学	49
三 事君不贰	54
四 屈原、司马迁之性格	57
五 性格和自我意识	65
第五章 人格悲剧	70
一 屈原人格与楚王、群臣人格之对立	70
二 汉武帝与司马迁的人格冲突	81
三 屈原、司马迁人格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	86

第六章 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	91
一 历史意识	91
二 文学意识	95
三 异乎经典之奇	103
(一) 屈赋——政治忧患的审美移置	103
(二) 《史记》——奇人、奇才、奇文	109
四 发愤抒情	117
结语	125
主要参考书目	127
后记	131
附录	
一 《〈淮南子〉的赋笔特征》	134
二 《〈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	140
三 《西汉的行政权力与民间文化》	154
四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59

绪 论

社会结构的运动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前者在其运动过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需要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的瞬息变化,总涌动着社会结构运动的潜流。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产生于意识形态的氛围之中,而艺术的质量则是由作者的人格决定的。一方面,人格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即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艺术三者的综合产物;另一方面,人格也可推动文化的发展、进步,因为个体人格的质量又反作用于文化的上升与下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卓越人格力量的引导,那么其自身文化也就变得陈旧、僵化、封固,生命力渐退,这对民族的文明进程而言,显然缺少鲜活的创造力。但当文化精英对自身文化的反省能力强烈地爆发出来时,或者从自身文化里搜寻过去的东西加以复兴,或者吸收异文化而抛弃自身文化传统,在抵触中创造新文化,其结果都会给文化以强而广的刺激和更新。文化的提升往往是在曲折坎坷中完成,个体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多数意志薄弱者均以屈从而告终。也有顽强者,在剧烈的对抗中,矛盾深化,虽然个体人格惨遭摧折,但其悲剧影响获得的共鸣却已革新并丰富了自己的传统。

屈原(前 339 年—前 285 年)与司马迁(前 135 年—?)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文化精英,他们的人格精神辉映千古。恩格斯说:

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

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①

中国士人的人格理想往往与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尖锐的冲突,预期的行动方案(人格目标)本是最合乎理想的,但具体的文化环境却迫使其变色,而士人面对现实这无形又无情的染缸,一贯坚持与社会的文化制度抗衡到底,展布出他们人格理想的正义性和捍卫人格的崇高性。

本书试图从文化对屈原与司马迁人格的熏染,人格悲剧之实质以及人格悲剧对文学作品之影响等方面作一论述,以阐释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中国文化变迁,以及相应的人格成长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力量。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第一章 研究概述

一、中西人格界定的差异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面具”(persona)。面具是在戏台上扮演角色所戴的特殊脸目,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中国心理学传统上把英文的 personality 译成“人格”,1949 年以后俄文中的 JINGHOSGTb 一词传到中国,学界把它译成“个性”。译法虽不同,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并无二致。人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G·W·Allport)曾综述过 50 个人格定义,由此可以想见人格概念的复杂性。综合而论,不外乎三大范畴:(1)社会学的人格定义;(2)生物学的人格定义;(3)心理学的人格定义。最初,西方学者是从严密的科学实验与观察中来探索人格的含义及其生成原因,这是西方的科学实证思维决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研究成为解答人类之谜的关键课题,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人格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们力图探求文化因素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着人格及人的行为,因为一个人经历的一切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成为了文化人类学和人格心理学的接壤处拓展出的一个新兴领域。到 20 世纪 50 年代,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注重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因素对该社会成员人格发展的影响,再由此发展到连续性的研究,学者的视线从原始社会的考察转到文明社会的探索。这些变化,正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反映。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先驱波亚士(F·Boas)在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R·Benedict)所著的《文化模式》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试图把握一种文化总体的意义的渴望,迫使我们考虑如何描述标准化的行为……对这些社会心理问题发生兴趣并不与历来的研究方法相冲突。相反,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①

这就肯定了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人格以及受人格影响的人的行为所作的阐释。欧美学者采取的人格研究方法主要有:行为观察与访谈、生活史的分析、投射测验、民俗和艺术的分析等。体现了他们所擅长的演绎及推理能力,如“投射测验”里的量化分析等。

中国先秦哲学,比之西方哲学,是在领悟人生而不是科学地对世界进行本体论的分析,因此它对人格的界定也自有特色。以入世为主的儒学为例,它既重视个人之适当发展以谋取社会幸福,同时亦重视社会责任以至个人人格之完善。个人不可侵犯之尊严与价值是儒家人格的核心信念。儒学是孔子对已经崩坏の礼乐文化进行反思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它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与传统,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人生的平衡。这种实践理性的特征,首肯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并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来定义人格的最高境界,《中庸》也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天下之达德”乃知、仁、勇的完美结合。其中知是指认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富有判断、推理的功能,能自觉地主导和支配行为,如《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便是诚意、正心、修身的前提和基础。仁是保证个体履行等级制度的社会义务与责任的文化目标。“恭宽信敏惠”是仁德的具体德目。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论语·里仁》);“求仁得仁,又何怨”(《论

① 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语·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孟子又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那么如何才不受境遇的影响且坚持人格尊严的原则呢?他提出以个体道德自律来树立伟大品格,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一种个体自发的善良本性的内在要求。荀子则着眼于个体修养必须服从于社会规范的整体统治,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来肯定人与天地并立的奋斗精神,极大地充实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内容,加之他吸收了墨家、道家、法家中冷静理智与重实际经验的历史因素,使儒学成为人类生存的实践力量。逮至汉代,儒学经官方的改造而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并逐渐向两个层面发展,其一,是证明君权神圣性的神学目的论;其二,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先秦儒学朴素的理想性和文化制衡意识变成了塑造国家管理者人格的思想工具。

由此可见,儒家是从群体观念和等级观念出发来确定人格的,因为社会是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故强调既要有独立的意志,又要“爱人”、“济众”,力争成为人格最高典范的“圣人”。同时,儒家的人格标准最重视道德价值,其对人格的理解是建立在人伦意识的范畴之内的。

二、屈原与司马迁人格研究述略

屈原生活在社会变化剧烈的战国后半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分庭抗礼;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屈原的心志与理念。他是被现实的烈火焚烧得只剩下灵魂和

人格的光芒的饱经忧患之士,他对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开拓精神世界的情感动力。因此,对屈原人格的研究一直是历代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

在西学传入中国以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提“人格”,往往定义在人类至高的道德品性的含意之上,甚至等同于品格(人品)。其实品格仅指人格的一部分,阿尔波特认为它是“估值的人格”(Personality evaluated),即“人格的尺度”,品格仅限于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定义,只能说人格愈健全,品格愈高尚。清代以前的《楚辞》学者没有用“人格”一词来评价屈原,但在他们的评述里已包容了“人格”的某些层面,主要集中于屈原的道德情操与爱国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梁启超首次将西方心理学词语“人格”运用于屈原的研究,这才对其性格和品德有创新的阐发。

在试图以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道家统领百家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笔下,屈原俨然是一个超于世俗的高士,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尧,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也引用了这段话来礼赞屈原的人格,他除了钦慕古典的孔子而外,和他的浪漫气质最相吻合的恐怕就是屈原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屈原正直忠贞的人格被楚王及其群小所摧折而作《离骚》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史记·屈原列传》的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深挚而沉痛的同情,他为屈原垂涕,为屈原讴歌,他明白屈原孤身与“愚妄战”的坚韧不屈,明知自己力量的单薄,但为着正义与光明,依然是“终刚强兮不可陵”。

东汉,儒家思想已成读书人的绝对信仰,“尊儒”意识之积淀长达两百年之久。《后汉书·儒林传》所载明帝即位之后,“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离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皮锡瑞称这一段为“经学的极盛时代”。儒家伦理的核心就是君臣忠义,君臣忠义是维护大一统政权行之有效的伦理思想准则,也是国家政治的内在凝聚力。西汉初年,士人在学术尚未定于一尊之前,还对战国士人的遭际和行事怀着一种渴慕与向往,但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这不过是徒然的梦想罢了。大一统权威是唯一的、不容异己的力量存在,绝对忠诚与认同政治权威是臣民天经地义的课业。儒学为帝王所欣赏,正是它对捍卫君权地位有无比的效力。《后汉书·儒林传》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故汉初的思想家从贾谊到董仲舒,均把以儒家礼仪原则构建的君臣关系作为立国之本。君臣忠义在东汉集权专制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又得到极大的宣扬,它是维护统治秩序的软件,故思想家们从人类的事亲之孝推而广之,扩大到君臣忠义,君臣名分得到空前的巩固,这对汉代士人的事君热情与忠诚,的确起了一番作用。在此种时代氛围和世代守儒的家庭环境的双重熏染下,班固自幼“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他虽也有豪迈奔放的《封燕然山铭》,但“纬六经,缀道纲”的儒家经学锁链束缚了他的凌云壮志,其心灵充溢着对朝廷与儒教的一片笃信之情。所以他的《离骚序》完全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离骚序》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淑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氏之论完全是儒家经学禁锢下的思想偏见,他说屈原“露才扬己”也正是从苛刻、严格意义的君臣之道来批评的,他认为屈原不加克制和隐藏的情感表现,不符合臣属的行为规范。

作为朝廷重臣的屈原,与凭借血缘关系获得个人权威资格的楚王之间是地地道道的君臣关系。在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要的是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于宗族圈内,已接受了这种生活意识,屈原要实现“美政”理想,也只有通过楚王的权势方可奏效。屈原

的“道”(真理)和楚王的“势”是一种天然的从属关系,不可抗衡。屈原“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蹇蹇兮,愿荇美之可光”(《抽思》)。朱熹说:“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楚辞集注》)但他忠君效国的品行,在当时并未得到楚王的重视,是汉人基于自身时代伦理宣传的需要,认同并极力抬高了屈原的忠君人格。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中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婉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考,终寿百年,盖志士所耻,愚夫所贱也。

宋代朱熹居官 10 年,后 40 年从事讲学和著述。他注《楚辞》之时,国家仅余半壁江山,南宋面对强大的金人的威逼无能为力,朝廷内部对主战与讲和分歧很大,朱熹力主抗金,故他在《楚辞集注》书中竭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和高尚品质,寄寓自己的爱国之情,斥责杨雄失节于新莽,为“屈原之罪人,《反骚》为《离骚》之谗贼”。朱熹的目的在于对当时主和派的民族投降主义实行间接批评。

明末清初的《楚辞》学者,因明代江山落于清人之手,他们从民族感情与个人仕宦的志节而言均不能接受现实的变故,多从自身与屈原的切肤之痛和亡国之悲的共鸣来阐释《楚辞》,他们讴歌的是屈原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个人节操。如黄文焕“憔悴约结,视屈百倍”,他在《楚辞听直》的《凡例》中说:“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屈子两千余年中,得两伪学,为之洗发机缘,固自奇异。而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将替,则尝与原同痛矣。”书中黄氏反复强调屈原的“忠”,借以寄托自己的牢骚不平。再如王夫之,挫折与痛苦多多,特别在追随桂王的抗清复明斗争中艰苦辗转,时遇小人之谗,历尽苦辛,故